

回忆亚东图书馆

YA DONG TU SHU GUAN

回忆亚东图书馆

汪原放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柳肇瑞

封面设计：潘宏生

回忆亚东图书馆

汪原放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6,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书号 7259·005

定价 0.79 元

序

王子野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排出清样后，编者寄给我看看并求作序。我早年同这家书店曾有过一段历史关系，对它的情况也知道一些，读了清样之后不能不说几句话，因此对编者所请欣然应命。

亚东从成立到停业恰恰是四十年，如果把它的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历史也算进去，应该是整整五十年（一九〇三年——一九五三年）。实际上作者的回忆正是这么算的。

亚东是一家很小很穷的独资经营的书店，五十年中先后进用职工不过五十来人。但它在我国近代新兴出版业中的地位却不能小看。它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个时期中产生的，所以它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称它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它的草创时期，从“五四”到大革命是它的黄金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它的后期出了一些坏书，影响不好。但从书后所附的出版物的目录来看，好书还是不少。其中特别是《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等几种文集，一批标

FH42/20

点整理的古典白话小说，“五四”以后涌现的一批新诗集以及蒋光慈等人的一批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品曾经风行一时，有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应该肯定它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贡献。在《新青年》、《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刊物的出版、推销工作上，也是很有成绩的。

作者的回忆比较全面，比较完整，每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讲得清清楚楚，基本上真实可信。由于亚东与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知名人士有很深的关系，交往频繁，回忆中所讲的都不是仅凭记忆，而是有物为证，到处引用日记、札记、书信、文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这是很可宝贵的。特别是陈独秀的狱中来信一束，对研究陈独秀的生平是大有用处的。这批信大约有五十多件，前年据汪无功（汪原放之子）同志来信说：原件已在“文革”中丢失，无法寻找。真可惜！

书中多处讲到这些名人的遗闻轶事，也不是得之于道听途说，而是都有比较可靠根据的。例如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恳切要求陈独秀出来担任文科学长，几次登门拜访（当时陈尚在上海编《新青年》，因事去北京，住在旅馆里），有时候一早就来，陈还没有起床，蔡不让茶房叫醒他，只让拿张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外等候。这件轶事是根据亲见者汪孟邹的回忆写的（见本书三五一三六页）。又如陈独秀与胡适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都是根据作者本人的日记整理出来的（见本书九四一九五页）。

关于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出版工作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但是过去材料很少。本书对上海的新青年社的情况以及它迁移广州的经过等都有较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的出版重心移到武汉，当时成立了中央出版

局,先是张太雷同志担任局长,后由汪原放接替(见本书一一六一—一七页),这段史实似是第一次披露于世。

出版史上还有许多问题过去都搞不清楚,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材料。例如《青年》杂志是如何发起的,后来又为什么改称《新青年》(见本书三一—三三页);又例如《向导》周报是如何创办起来的(见本书七九—八〇页),作者都引用日记材料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此外还有五四时期几种《文存》的编辑出版经过,“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的标点、校读和出版情况,都是出版史料研究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在这部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因为标点白话小说的工作就是本书作者所做,所以讲得最清楚。有些事要是他不讲,谁也不知道。例如陈独秀为《儒林外史》写的序原来是汪原放写的,经过陈独秀修改了几个字就署了陈的名字发表了。这样的事如果作者不作交代,将来的版本学家就无法弄清。还有商务的《万有文库》,以前都知道是王云五搞的,读了这部回忆录才知道最初的倡议者是胡适,得到高梦旦和张元济的赞同才搞起来的(见本书九九页)。

总之,这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书,研究近代革命史和出版史的人从中可以发现某些别处见不到的有用资料。还有这部回忆录的写法也别具一格,一忽儿引一封信,一忽儿引一段日记,一忽儿来一段对话,写得生动活泼,读起来引人入胜。

假如研究出版史有一个学习前人经验的目的,那么我以为在亚东这家小书店的历史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对待出版工作严肃认真。这主要表现在出版“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上。亚东在和当时上海滩上搞“一折八扣”粗制滥造书的书商作竞争中虽然吃了败仗,仍然坚持自己的

谨严作风，决不为争夺市场而去追踪粗制滥造的恶劣行径。宁可卖不掉，也不能自毁声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第二，讲究工作效率，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加快出版周期。在这部回忆录中讲到，一部上千页的《水浒传》从标点、校读到付排、印制成书，先后只有八个月，而标点、校读工作只有两个人担任。《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版也是同样高速度。虽然速度这么高，却又能保证质量，这真不容易。鲁迅对这些标点和校正的白话小说作了公正的评语：“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一九四七年十月有位署名萧聪的评论家在《大公报》写了文章表扬“亚东版的书籍，校对特别仔细，错字几乎没有，版本形式也特别优美”。说亚东版的书籍错字比较少是对的，说没有错字不符合事实。我最近查阅《胡适文存》三集，就发现了错字，连标题的头号字也错了几个。校对完全不出错字是很难的。

三十年代初我在亚东工作的几年，对他们工作作风中的以上两条优点是深有感受的。也许是因为年轻时受了这种感染，所以毕生对出版工作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亚东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由受维新思想影响而对新书业发生兴趣，同盟会革命来了，他又同情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他逐渐倾向同情共产主义。他说共产党好，但是他怕得很，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这是老实话。我在上海的几年，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汪原放是一位学者，经常埋头校读古书和翻译。这两位出版界的老前辈曾经给我许多有益的教诲，支持和鼓励我业余自学，介绍我读进步书刊，赢得我对他们的尊敬。汪孟老我在一九三四年离开亚东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一九五〇年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时，在特邀

代表中有他的名字，我多么盼望能在北京和他见面。可惜他因年老体衰，不堪旅途之劳，终于没有能来。同汪原老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去上海参加科普创作会议时。这时他已达八十一岁高龄了。见面之下，高兴之极，晤谈三小时以上，毫无倦容，分别时还约定下次到上海再去看他。想不到两年后他竟与世长辞，再也见不到面了。

在写这篇序文时不能不怀念这两位可敬的老前辈。

最后再交代一下本书前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的来历。这张照片是我父亲保留下来的遗物，去年我的侄儿回绩溪老家去找来的。照片前排左起第四人程健行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旧学很有修养的人，工作认真踏实。本书中提到他帮助汪协如校点《缀白裘》，花了不少时间精力。我查《缀白裘》的《校读后记》，的确是这么讲的。可惜他在一九三〇年春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五岁。父亲去世后留下寡母和五个孤儿。我居长，才十四岁，最小的弟弟才三岁。不用说，我们家庭里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于是托人将我介绍到亚东去当学徒，这样我就在亚东工作了四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四年）。在亚东四年的业余自学生涯对我一生影响至大，它不仅使我学到了基础的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革命思想，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我后来参加革命的思想准备莫下了第一块基石。

书后的亚东图书馆同人名单中的程敷铎就是我的原名。改用今名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后开始的，姓王是随母姓。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

(1928年9月24日)

自左至右,前排:汪协如、汪乃刚、章希吕、程健行、余昌之;后排:章近江、章志金、章焕堂、汪原放、吴嗣民、周道谋。

上海亚东图书馆是在我国现代新兴出版业中起过相当影响的一家书店。它的主人、汪原放的叔父汪孟邹，同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知名人士有很深的关系，交往频繁，在汪原放的这本回忆中多所涉及。难得的是，这些回忆不仅凭记忆，而是有物为证，到处引用日记、札记、书信、文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因此，它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史、文化史和出版史的研究，都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目 录

序 王子野(1)

第一章 皖南三青年

先抄一封旧信(1)——“弃书学剑亦英雄”(3)——交得一班好朋友(4)——三兄弟剩下的一个终于“抛剑经商”(6)

第二章 芜湖“洋书店”与《安徽俗话报》

出门“寻生意”(8)——为什么人们叫它“洋书店”? (9)——闲谈过去的事情(11)——开办《俗话报》的缘起(13)——所谓“洪水猛兽”(15)

第三章 到上海办书店

武昌炮响以后(18)——惠福里—平和里—福华里(21)——《亚东宣言》和初期的出书(23)

• 1 •

第四章 《甲寅》杂志迁沪,《青年》杂志

创办

一则“秋桐白事”(28)——《名家小说》出版(30)——《新青年》的诞生(31)——仲、孟北上(33)

第五章 “五四”前后

出弄堂,上马路(37)——经理北大的出版物(38)——《建设》杂志与朱执信(40)——《少年中国》、《新潮》及其他(43)——乔年出国(46)——大叔吃了一趟官司(49)——仲翁被捕(50)——《尝试集》与《三叶集》(52)——“新青年社”独立(53)

第六章 “亚东版”古典小说

要出标点、分段的《水浒》(56)——适之兄南来(60)——仲翁提携后进(63)——三封信和一席谈(66)——鲁迅先生的误会(69)

第七章 几种“文存”的出版

《胡适文存》带出了《吴虞文录》(71)——出版了的和夭折了的《独秀文存》等(75)——这两年还出了哪些书?(78)——十年纪念(81)

第八章 编辑所正式成立后的头几年

出书与组稿(83)——家事和店事(88)——

与仲翁、适之兄等的往还(91)——又出了
三十几种新书(103)

第九章 大革命高潮中

乔年回上海(105)——“我希望加入共产党”(106)——上海总工会公开(108)——
和赵容同志接头后(109)——去武汉(110)
——开始在《民国日报》工作(112)——见
到陈仲翁(113)——国民党中央党部会上
(113)——二次北伐誓师典礼(114)——外
部的工作和内部的工作(116)——民国日
报馆(117)——中央出版局(118)——长江
书店(119)——长江印刷厂(120)——宏源
纸行(121)——史精益拿田契去卖(122)
——风声一天天紧了(123)——要一张“护
身符”(126)——陪陈仲翁回上海(127)——
回到上海以后(130)

第十章 盗版、禁书及其他

重排《红楼梦》(133)——乔年牺牲(134)
——五年新出的书(138)——出现了盗版
(141)——禁书种种(144)——叔侄相左
(148)——又去北平(151)

第十一章 狱中来信一束

陈仲翁又被捕(155)——去南京看望
(156)——关于章律师的答辩(159)——关

于买书(160)——关于亚东的出书和经营
(164)——关于重印《独秀文存》(168)——
关于朋友交往(170)

第十二章 江河日下

一九三二到三四年的出书(173)——营
业很差(177)——“群益”的保发生问题
(183)——大叔回店后(186)——又一次北
平之行(188)——“八一三”以后(193)——
仲甫从出狱到病逝(198)——故乡四载
(201)——回到上海(203)——从解放以后
到歇业(210)

收 尾 (214)

附 录

亚东图书馆出版物目录 (216)
亚东图书馆同人名录 (229)
1919 年至 1935 年亚东图书馆收支情况 (230)
1934 年亚东图书馆国内外代售处一览 (232)
汪原放先生传略 (240)

编后记 (243)

第一章 皖南三青年

晚清时，皖南山城绩溪如果没有三个青年先先后后的到南京求学，就不会有芜湖科学图书社；没有芜湖科学图书社，卖过图书、仪器，出过杂志、新书，也一定不会有上海亚东图书馆。

先抄一封旧信

我想来想去，不如先抄一封哥哥给弟弟的信在下面。这是一封几十年前的旧信了，是先君希颜先生(1873—1902)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写到安徽绩溪老家给先大叔孟邹先生(1878—1953)的。用这封信开头，我认为还妥当，因为接信的人就是后来先开芜湖科学图书社，后开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先大叔。这实在是封长信，且只录一节罢。

孟邹吾弟左右：

兄自二月初四日(1902年3月13日)到堂，各种功课，知新温故，两无所有。东文虽较西文为易(日本语言难学，与西语同，而文字则较易，堂中分文字、语言为二班，兄是在文字班内)，而每日为时太促，进功颇迟。惟在上海购得新书、新报数种，日夕观览，大鼓志气，大作情

神，大拓胸襟，大增智慧。其得力最多者为日本新出之《新民丛报》^①，其宗旨在提倡一国之文明，其体例则组织学界之条理，中外双钩于笔底，古今一冶于胸中。吾谓学游六年，不如读此报一年；读书十卷，不如读此报一卷。此报一出，而一切之日报、旬报、月报，皆可废矣。何则？他报之能开风气者，述政艺不为不精（如《汇报》、《政艺通报》等），唱民权不为不烈（如《国民报》、《中外日报》、《选报》、《清议报》等），论外患不为不切（各报皆然），置时局不为不快（亦各报所有，而惟《中外日报》、《选报》、《清议报》、《国民报》为最），讲学术不为不新，而究未有本天演之公例，辟人群之义务，洞环球之全局，澈教育之根源，如《新民丛报》者。

凡兹所言，弟未之见，亦难深信，兄已屡读而亦不能殚述，故虽价目不廉（每月两册，而字数不啻三册之多，连邮每份五元二角四分），兄既自购一份，又为吾弟另办一份，负欠典衣，在所不顾，而此报终不可不阅也。……

自今以往，吾辈但无冻馁，不以富贵为可羨，不以贫贱为可忧，不以世俗之毁誉关心，不以浮名之得失为虑，努力求学，努力做事，务养成二十世纪上一个人之资格。盖世界不同，立于世界之法亦自不同。弟读《天演论》，未通其意，望再读一过，并俟此报寄到，参观互证，当必恍然有悟。是耶？非耶？容与我弟辩难之。

① 《新民丛报》，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梁启超主编。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1907年冬停刊。初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抨击封建顽固派，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后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长信只录到这里为止。这封长信是先君在1902年3月25、26日写的。真很不幸，便是那一年的夏天，先君竟一病而去世于江南陆师学堂。

“弃书学剑亦英雄”

我为什么开头要先抄一段长信呢？

是不是表示，在那时，他们兄弟的思想是相当前进的呢？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接着是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那以后的一段年月里，《新民丛报》的影响，真很不小。单这一封信，也就可以看得出，那时关心国事的人文学子，只要读到《新民丛报》，没有不是如得异宝的。先大叔后来读到这个杂志，同样是如醉如痴。至于他们后来并不赞成君主立宪，那是后话。还有《天演论》，在那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凡是爱国的，要向新的方面努力前进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也没有不受它的影响的。

先抄这封长信，还因为要说到科学图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实在不能不先说到这两个书店的创办人的家庭情况；说到这一点，事实上又应该先说到“弃书学剑亦英雄，兄弟商量意见同”（先君句）的三个兄弟，怎么先后出门求学的往事。

先君是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到南京求学的。他是山城绩溪相当早的一个出门讲求新学的人。先君和先大叔都是二十岁左右中秀才的。早年他们同嫡堂的先二叔杰夫先生一起在家，由胡晋接（子承）先生教读。据先大叔回忆：业师胡子承先生非常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思想，常常叫我们要多读历史、地理以及新书、新报。后来，先君考进了江